

● 黄留珠 魏全瑞 主编

周秦汉唐

文化研究

第一辑



• 黄留珠 魏全瑞 主编

周秦汉唐

文化研究

第一辑

•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辑/黄留珠 魏全瑞 主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10
(周秦汉唐文化工程/魏全瑞 主编)
ISBN7-80628-635-7

I. 周… II. ①黄…②魏… III. 文化—研究—中国
—古代 IV.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4274 号

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辑)

黄留珠 魏全瑞 主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话 (029)7205106 7264325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5
字数 45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7-80628-635-7/K·262
定价 48.00 元

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
三 泰 出 版 社 合 力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石兴邦 田余庆 李学勤 启功 季羨林 何茲全

张岂之 林甘泉 傅璇琮

主编

黄留珠 魏全瑞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光华 王子今 王学理 李郁 [港]吕宗力 辛德勇

张国安 [台]陈文豪 陈锋 周伟洲 赵世超 赵建黎

黄留珠 [日]富谷至 魏全瑞

发刊词

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地处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与西北惟一的古籍出版社三秦出版社,联手推出大型学术年刊——《周秦汉唐文化研究》。

周、秦、汉、唐,是中国古代史上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王朝,是令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时代。今天深入研究这段辉煌的历史,对于正确认识过去,科学把握未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振汉唐雄风,无不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安是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地,这里具有从事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得天独厚的特殊优势。作为古城西安周秦汉唐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和以出版周秦汉唐典籍及研究成果为主的出版单位,义不容辞地有责任共同将西安研究周秦汉唐文化的优势推展开来,使其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学人所共享。为此,我们特创办这一年刊,旨在给广大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者提供一个相互切磋、彼此交流的学术阵地。

《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年刊,由学术研究、学术评论、学术资讯三大板块组成。“研究”板块专供发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主要是周秦汉唐历史、考古、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评论”板块是对年刊出版前一年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状况进行述评的专栏。“资讯”板块将为读者提供年刊出版前一年海内外有关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主要论著的目录信息。像这样一种把“研究”、“评论”、“资讯”三者相结合的学术刊物,目前似乎还不多见。我们希望以这样的组合,至少在形式上体现出某些特色。

本年刊虽然冠以“周秦汉唐”之名,但所论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面向

着中国古代自先秦到唐宋这样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关于宋以后的问题，由于去周秦汉唐稍远，则不在本刊论列范围之内。当然，对于某些需要贯通考索者，也可不受此限。总之，本刊以周秦汉唐为主，基本涵盖中国古代社会的前半段而略有下延。

推进学术发展，繁荣学术研究，是我们努力的总目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遵循的基本准则。高水平，求创新，是我们办刊的灵魂。我们有信心，以上乘的质量，以与时俱进的态势，立足于学术刊物之林，以与我们陕西的秦陵兵马俑、汉阳陵、唐法门寺等震惊世界的胜迹交相辉映。我们竭诚希望得到中外学术界朋友的大力支持，欢迎学界同仁积极惠赐大作，共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的事业，以使我们的刊物在中华民族迈向繁荣富强的征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002年9月28日

目 录

发刊词 (1)

学术研究

- 孙达人 郑国渠的布线及其变迁考 (3)
袁仲一 关于秦始皇陵原始文献解读的若干浅见 (35)
方光华 试论汉代的《春秋》公羊学 (43)
[港]黎明钊 同乡、同里与异姓丘里 (63)
李 浩 谈唐代的贤能标准 (83)
曲安京 宋代易学中的非十进制记数法与贾宪三角形 (102)

廖名春 帛书《衷》校释(一) (114)
吴玉贵 《旧唐书》拾误 (127)

学术评论

- 常金仓 2001 年两周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143)
王子今 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 (177)
张国刚 夏 炎 2001 年唐代研究综述 (199)
[台]陈文豪 2001 年台湾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综述 (248)
[日]富谷 至 2001 年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秦汉至六朝)研究 (259)

程 钢 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268)
陈明光 洪 钢 20 世纪魏晋南北朝财政史研究述评 (286)

学术资讯

- 田延峰 陈 博 2001 年中国大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论著要目 (321)
[台]陈文豪 2001 年台湾周秦汉唐研究论著目录 (366)
刘恒武 2001 年度日本出版和发表的中国学(商周秦汉唐)著书与论文目录 (377)

CONTENTS

Research of the Course of Zhengguo Canal and Its Change	<i>Sun Daren</i> (3)
Some View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s in the Tomb of Emperor Qin Shi Huang	<i>Yuan Zhongyi</i> (35)
A Trial Analysis of Gongyang School in Chun Qiu (春秋) in the Han Dynasty ...	<i>Fang Guanghua</i> (43)
People from the Same Xiang and Li and Different Surnames	<i>Li Mingzhao</i> (63)
The Standards of Virtuous and Talented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i>Li Hao</i> (83)
The Non - Decimal System and a Pascal's Triangle in <i>Yijing</i> in the song Dynasty	<i>Qu Anjing</i> (102)
Proofreading and Explanation of <i>Zhong</i> (衷) Copied on Silk (I)	<i>Liao Mingchun</i> (114)
Find Mistakes in <i>Jiu Tang Shu</i> (旧唐书).....	<i>Wu Yugui</i> (127)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Zhou Dynasties in 2001	<i>Chang Jincang</i> (143)
The Researches of the Culture of the Qin and the Han Dynasti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i>Wang Zijin</i> (177)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e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2001	<i>Zhang Guogang</i> <i>Xia Yan</i> (199)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es of the Culture of the Zhou, the Qin, the H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 in Taiwan in 2001	<i>Chen Wenhao</i> (248)
The Researche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Qin to the Six Dynasties) in Japan in 2001	<i>Idaru Tomiya</i> (259)
The Researches by the Western Schola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Thoughts of the Pre - Qin Times	<i>Cheng Gang</i> (268)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f the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 the 20th Century	<i>Chen Mingguang</i> <i>Hong Gang</i> (286)
A Title Catalogue of the Main Books Published on the Researches of the Culture of the Zhou, the Qin, the H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 2001	<i>Tian Yanfeng</i> <i>Chen Bo</i> (321)
A Title Catalogue of the Books Published on the Researches of the Zhou, the Qin, the Han and the Tang Dynasties in Taiwan in 2001	<i>Chen Wenhao</i> (366)
A Title Catalogue of the Books and Papers Published on Chinese Studies (from the Shang to the Tang Dynasties) in Japan in 2001	<i>Liu Hengwu</i> (377)

学术研究

郑国渠的布线及其变迁考

孙达人

中国人都知道万里长城，它在世界上也很有名；而知道郑国渠的人则很少，即使在国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但资料的缺乏并不是主要的。在印刷术普遍使用之前，传世的著述都比较简略。试问：与郑国渠基本处在同一时代的所有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件，无论是万里长城、大运河，还是秦始皇陵、“丝绸之路”等等，有哪一事件的历史记载不是十分稀少的？若论研究状况，事情可就大不相同了：与其它问题研究成果众多不同，在现代中国史学中郑国渠的研究历来很少有人问津。迄今为止，以它为专题的著作只在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出过一本《郑国渠》；世纪末出版了《泾惠渠志》，那是《陕西省水利志》的一个组成部分^①。正是因为缺乏深入研究，当今学界对郑国渠的认识还处在相当粗浅的阶段：我们既不能提供一种与它的历史地位相称的总体评价，甚至于对与它相关的各个大小问题几乎也事事都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出现了言人人殊的困境。

在我看来，尽管郑国渠与万里长城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工程，但对中国历史进程而言，却至少具有与后者一样的重要性。当我试图把郑国渠与万里长城、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相提并论时，深知自己的观点有可能与时下盛行的历史观念、与我们熟知的现状之间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果认定建成于秦时的郑国渠是中国传统时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而它在唐宋以后又衰落了，那么，这种事实将从一个侧面表明历史进程并非总是向前发展，而是起伏不定的，既有发展和进步，也有停滞和倒退，从而与盛行已久的进化论观念相悖；如果中国传统时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恰恰建成于比较干旱的西北地区，而不是南方地区，那么，这种事实表明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从

而使历史与现状相反。这样,我们将面对三个似乎不合逻辑的问题:为什么传统中国的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恰恰建成于较早的时代,并且又在水源比较欠缺的西北地区?为什么在此后整个中国的传统时代,无论北方还是继起的南方都没有再建成过其作用足以与郑国渠相媲美的水利工程?为什么这个规模宏大的工程在唐宋以后竟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预先向读者报告:在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番认真思索之后,突然发现对过去习以为常的材料有了一些新认识,并且还自以为在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把郑国渠与万里长城等伟大工程相提并论就是这种思考的产物。

郑国渠及其变迁这个课题涉时超过二千年,包含着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容,范围很大。本文暂不讨论诸如大坝、水门之类的技术问题,也不拟牵涉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环境问题,而只打算把郑国渠的干渠布线及其变迁作为探讨的主题,其目的限于弄清与干渠相关的基本事实,以便为其它重要问题的研究作必要的准备。

郑国渠干渠布线考

郑国渠始建于秦始皇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46年。这个沟通泾水和洛水的水利工程其实不止是一条普通的灌溉渠道,同时也是一条常年通水的河流,其灌溉面积囊括了泾洛之间整个的渭北平原,效益十分巨大。《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对此是这样记载的:“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灌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过了136年,到汉武帝时代,先后又兴建了六辅渠和白渠。《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对六辅渠和白渠是这样记载的:“自郑国渠起,至(汉武帝)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卬之田。……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

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六辅渠显然是为灌溉郑国渠旁它所灌溉不及的高地而修建的，白渠的修建其实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充郑国渠的灌溉能力。所以，民谣中把郑国渠和白渠并称，班固在这里简称为“两渠”，而在《两都赋》又称“郑、白之沃，……堤封五万”。按郑国渠灌四万余顷，白渠灌四千五百余顷，加之六辅渠的所灌，到西汉武帝时郑白两渠的灌溉总数当在五万顷左右。

此后，到东汉末年，在泾水入渭处不远的阳陵邑东又兴建了一个新的水利工程，名曰樊惠渠^②。不过，也许此渠使用的时间较短，发生的作用有限，在文献中再没有别人提起。

自汉代以后直至北魏，有关郑国渠和白渠整修的记载仅见二次，第一次是在前秦苻坚的主持下完成的：“(苻)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③这段记载表明，当时对郑国渠和白渠进行了整修，重点在“泾水上源”，修复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凿山起堤，通渠引渎”，而目的仍和郑国创渠时相同，灌溉盐碱化的土地。至于此次整修的效果，据说也曾经达到了“国富兵强，……秦国大治”^④。到公元488年，郑国渠和白渠进行了又一次整修。关于此事的记载见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五月丁酉诏书中：“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这是一份全面整修当时西北部中国水利工程的诏书，而郑国渠和白渠只是“关内六郡”众多水利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惜，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略，不知其工程内涵。不过有一个事实可以肯定，通过此次整修郑白两渠仍是畅通的。^⑤

自秦至北魏的七百年间，有关郑国渠和白渠的主要记载就是以上这些。尽管所有的记载都很简略，但这两大工程终究不是花瓶式的东西，只在历史上昙花一现，而是始终发生着巨大作用的宏大工程。因此，研究郑国渠，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记载中的每一个字，并把它与其它相关的事实在起来作通盘考虑，既不可因其文字简略而稍有疏忽，更加不能胶柱鼓瑟，读其文而失其意。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者深思：郑白渠到北魏末年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恰恰从这个时期开始相关的记载反而日渐增多起来。所有这些晚出的记载都极其宝贵，它是有关两渠存世的首次记录，记录的又是后人所不可能

见到的事实。其中,尤以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和北宋官员皇甫选等人的报告最有价值。前者所处的时代是郑国渠遭到了严重破坏的北魏末年,他记录了郑国渠的所经,当时哪些段落遭到了破坏,哪些段落仍在使用的情况,内涵极其丰富,描述十分准确。后者则处在郑国渠已成为历史古迹^⑥的北宋时期。宋太宗皇帝非常热衷于修复郑国渠,皇甫选和何亮就是受命于宋太宗赴现场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由于工程太大,当时修复郑国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让我们首先从他们的报告中摘引出有关郑国渠的一段话:“周览郑渠之制,用功最大。并仲山而东,凿断冈阜,首尾三百余里,连亘山足,岸壁颓坏,堙废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泾河平浅,直入渠口。暨年代浸远,泾河陡深,水势渐下,与渠口相悬,水不能至。峻崖之处,渠岸摧毁,荒废岁久,实难致力。”^⑦皇甫选等人所讲的虽是郑国渠遭到彻底毁坏时的状况,却是现存史籍中第一次对此渠的宏大規模所遗留下来唯一比较具体的记载,非常有助于我们把过去史籍中简略的文字进一步充实起来。自司马迁以来各种史籍一直都说郑国渠“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这究竟是不是事实呢?根据这份报告可知,郑国渠确实是把主渠道始终布置在仲山以东三百多里的“山足”,而为了实现这样的布线,沿途还实施了诸如“凿断冈阜”等等巨大的工程措施。(论理这样的工程措施肯定会在地下留存遗迹,希望考古工作者能够及早把它发现出来!)但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一方面由于郑国渠的工程规模“用功最大”,另一方面泾河河床下切很深,使渠口已经远离水面,堤岸的崩毁又在沿途造成了不少断崖和缺口。这样,在他们看来,如果白渠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的话,那么,修复郑国渠便是一件“实难致力”的事。

比皇甫选和何亮早五百年的郦道元记载了更加宝贵而又丰富的情况。只要认真地研读他的记载,几乎能把郑国渠建成以来有关的主要事实基本上恢复起来。

据《水经注》,沿北山东行布线的郑国渠干渠大体可以分为上中下三段^⑧:上段从泾水之滨的瓠口至浊水。瓠口也叫瓠中,亦即《尔雅》所说的焦获藪^⑨。这里本是一个天然的沼泽,而郑国渠建成后便形成一个人工湖面^⑩。主干渠就是从这里被首先引向东面的仲山。本来,郑国渠完全可以采用自瓠口直接取道东南向布线的便捷方案,然而,在郑国渠存在的全部时间内,渠首从引泾口开始就取道东向,然后一直沿着北山蜿蜒曲折地向东布线,即所谓“连亘山

足”。现代学者几乎都没有充分重现郑国渠始终沿山足布线的事实，以致于认为历代引泾故道在小龙潭以下到三限口为止均与现代泾惠渠线路基本一致。其实，这种说法只是对唐以来的三白渠而言才是正确的。要是就郑国渠来说，这种说法就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宋神宗时，有人准备在唐三白渠口小龙潭以上另开新口下接唐三白渠故道时就指出，当时这段三白渠在“古郑渠南岸”，亦就是说唐三白渠的渠首段和郑国渠根本不同，布线高程也要低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留待后文“白渠布线考”和“三白渠布线考”中再说。此外，考古工作者的初步探查也已发现此说不确。例如，现代的泾惠渠在今王桥镇南经过，这与三白渠所经相同，然而在王桥镇北的土崖上却存留着郑国渠的渠道遗迹；再如，泾惠渠在今王桥镇东李仪祉陵园南面经过，这与三白渠所经亦同，然而，在该陵园最高处的西围墙外，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有郑国渠的遗迹^①。以上两者的高差约在十米左右，说明郑国渠干渠的布线远远高于唐时的三白渠和后来的泾惠渠。

郑国渠曲折东行，在经过仲山之南时“绝治谷水”，在继续东向经过嵯峨山南、池阳故城北时又“东绝清水”。治水出治峪后，流淌在离嵯峨山不远处，而且不久又汇入清水。郑国渠的布线不在治水合清水后作一次性的拦截（假如这样布线，又可以得利用治水河道之便），而要分别作二次拦截，这个事实同样可以证明，郑国渠之所以如此布线显然仍出于把渠线布置在较高引水高程的需要。不言而喻，这样的布线又表明在今治水之北的仲山和嵯峨山麓必定会有一段为郑国渠而特别开凿的渠道，殷切地希望考古工作者能把它探查出来。

郑国渠的上段布线在仲山和嵯峨山之麓，它的中段就沿着北原东行。仲山、嵯峨山和北原相连，自古至今被统称为北山。不过前两者由于基本是石质山体，治水和清水就比较清澈。浊水则源于黄土高原，水质不免混浊。从这里开始，郑国渠就一直沿着北原（请特别注意，《水经注》原文作“又东历原”。这就是说，它不是经原上，也非原下，而是沿着原边布渠。）东行，经过了北原东部“汉太上陵”下。古代的许多地名因历史的变迁而很难准确定位，但所谓“汉太上陵”就是埋葬汉高祖刘邦乃父的那座坟墓，地址在今富平县吕村乡姚村地界。这个地方处于今日的石川河之旁，对认定郑国渠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当郑国渠从清峪河口进一步东行到北原之下时，由北而南的浊水

又泄入了它的渠道。北原过去曾被称为荆山，从山下流过的这一段渠道因此也就被称为“荆渠”。晋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说：“禹铸鼎於荆山，在冯翊怀德之南，今其下荆渠也。”^⑩这个事实证明到晋代郑国渠的中段无疑还是畅通的。前文刚刚说过，到前秦时“泾水上源”这一段渠道经过了有效的整修，到北魏时也仍在运行。但到了北魏末年，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已把自瓠口到浊水的这一段称之为“郑渠故渎”，并明确指出当时这一段“今无水”，也就是说郑国渠浊水以上的这一段自秦运行至此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断流。

郑国渠之所以始终沿着北山布线，其目的显然在于汇集渭河以北的各条水流，其中最重要的是沮水（亦即石川河），以便最终实现沟通泾洛、取得最大的灌溉效果。在这里，穿越沮水是关键之着。环境（自然的，亦包括社会的）的变迁如此之大，以致在元代以后的人看来，穿越沮水（亦即石川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在《水经注》中此事却被轻松地一笔带过。那么，郑国渠的穿越沮水究竟是怎样实现的？

细读《水经注》原文并结合现场考察可知，郑国渠为此采取了三个关键性的措施。第一着，当吸纳了浊水的郑渠抵达“汉太上陵”南时，原先的东流的干渠先是折而向北流，与从北原之北、自西而来的沮水汇合。第二着，汇合了沮水之后的郑国渠又被一分为二：其中一支向东南流，进入栎阳地区，因此当时又把这段水流称为栎阳渠，而在栎阳渠的下游就是石川河。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说到白渠走向时还要再详细讨论。另一支则向东流，是为沮水，亦即郑国渠的主渠道。第三着，东出的郑国渠又汇合了自西而来的泽泉。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当时别说沮水，即就泽泉的水源也相当充沛，因为它的上游还有一个不小的沼泽—沮东泽。泽泉后来叫温泉河，亦称苇子河。2001年10月上旬，我与文物、农史、地质界的一些朋友到这里进行了初步考察，有两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深思：其一，今天的石川河亦即沮水由西向东，就在“汉太上陵”下折而向南，郑国渠本来完全可以在此陵的东南汇入沮水，为什么却要先逆而北之后再汇入沮水呢？其二，在现今的石川河以东的东上官乡一带尚存一段郑国渠的遗迹，宽约40米左右^⑪。当我们要看这一段渠道遗迹时竟必须从石川河的一级阶地爬上大约5米以上的小坡。同行的冯希杰博士用定位仪测得郑国渠在这里的高程为417米左右。元代这一带的环境与今天应该比较接近，难怪乎那时的人认为郑国渠之穿越沮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过去

的郑国渠就做成了一件在后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

通过上述考察,对《水经注》中有关的记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郑国渠中段之所以要在“汉太上陵”下先逆沮水方向而上,然后再与它合流,这仍是出于使郑国渠布线必须保持必要引水高程的需要;至于郑国渠在这里的遗迹为海拔417米的事实又表明,当它在一千五百年前能够正常运行时,这里的地貌环境与后来很不相同,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当时沮水河床就是今天的一级阶地,所以郑国渠的遗迹就高悬在今日的石川河的二级阶地之上,远离了河床。诸如此类的事实提醒我们,不考虑当日的环境,确实难以真正理解郑国渠这样伟大的工程。

根据《水经注》可知,在郑国渠上段干涸了的北魏末年,从浊水到泽泉的中段仍在使用。当然,它的水源,以前是集泾、治、清、浊诸水之后再汇合沮水和泽泉,而当上段断流之后便只能靠浊水、沮水和泽泉了。这是郑国渠在北魏末年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

穿过了沮水和泽泉之后,郑国渠进入了下段。这一段的走向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意见。清代学者以胡渭、杨守敬为代表,基本上遵从《水经注》的记载,但他们所认定的渠线有过于偏北之弊。现代学者除了个别人^⑩之外,几乎都撇开了《水经注》,而他们重新提出的线路则可能包含着更多弊端。在历史研究中,没有足够的证据就轻易否定明确而又系统的历史记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要知道,在这漫长的时间中,由于自然和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许多今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其实是可能的。在这里我将仍然依据《水经注》并利用现有的考古成果继续考察最后一段的走向。

北魏末年,郑国渠的这一段,起初主要仍用沮水,在它向东经过了汉代的频阳县故城南面的当道城之南时,它又汇合了发源于频山的频水。郦道元对此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频阳县就是秦厉公所建的频阳宫,由于城北有频山,所以历史上才称之为频阳;他还特别引用东汉应劭的话指明:频阳县城本来是在“频水之阳”^⑪,而频水晋人也有记载^⑫。郦道元同时又特别指出,当时已找不到频水。用他的话说:在频阳县故城附近的地方“无水以应之,所可当者,惟郑渠与沮水。”换言之,当年郑国渠流到这里时,郑渠与沮水很可能就沿用了频水河道。十分遗憾,假如在北魏末年郦道元还能从当地的郑国渠和沮水中依稀看到频水的由来,那么,此后当郑国渠彻底埋塞之后,频水的名